

茶道西行 燕梳东渐

谢志刚 |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谢志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茶道燕梳首席茶道馆。

英国利兹大学博士;中国精算师协会(CAA)会员、理事,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荣誉精算师;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上海市保险学会精算专业委员会主任,《精算通讯》主编,《亚太风险管理与保险学报(Asia-Pacific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编委委员;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是保险与金融业全面风险管理及监管、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与偿付能力评估与监管,是国内外在该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

一、茶与茶道

茶与茶道,起源于中国,凝聚着东方文化的内涵,经“一带”和“一路”传播到西方,走向世界,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影响了世界。比如英国,虽然不产茶,但举国上下都喝“下午茶”,曾一度喝出巨大贸易逆差;又如美国,因“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了独立战争,当年的“茶党”,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从“一带”走水路出去的茶,主要去了英国和欧洲大陆,采用了闽南话的发音,成为今天英语中的tea;从“一路”运出的茶,主要运至西亚和中亚国家,也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还覆盖了我国西部的甘肃、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地区。走这条旱路的茶,延续我国中原地带的习惯,仍然称作“cha”。

二、燕梳与保险

燕梳,舶来词,insurance的广东话发音,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管理风险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贸易一起来华,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1805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戴维森(W. S. Davidson)发起创设的Canton Insurance Society,中文叫做“谏当保安行”,直到六十年后的1865年5月25日,《上海新报》刊登由民族资本发起成立的“义和公司保险行”开业公告,燕梳(insurance)才正式在中文公开文献中被称作“保险”。其间,1842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中将其

译作“担保”;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1822—1864),在《资政新篇》中将其直接称之为“保”。

从“谏当保安行”到“义和公司保险行”,从“保安”到“保险”,中文字面意思完全相反,也折射出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一个持续和动态演变过程。

这个演变过程从未停止过,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都在不停地变化着,也彼此相互影响着。要想看到这一点,不妨将今天的“保险”与四十年前的同一概念作一比较。

三、贸易与服务贸易

传统上的燕梳或保险,最早只是作为伴随商业贸易的一种风险转移和分摊机制,仅仅是为实物贸易提供配套服务,其本身并不作为贸易标的。但时过境迁,当代西方的许多机构,不仅以提供保险和金融服务为主业,而且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提供这种服务,属于全球化经营的国际公司,很自然,它们的直接诉求就是要让世界各国为其开放市场和经营条件。

这类典型的国际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AIG),其前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福特总统任期内就应邀出任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Advisory Committee on Trade Policy and Negotiation,简称ACTPN)委员,提出并积极参与推动“服务贸易

(trade in service)”的概念,也就是要将“服务”与过去传统的“实物”至少置于同等贸易地位。又经过从卡特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历届 ACTPN 委员的持续努力,不断地将美国《1974 年贸易法》及其“301 条款”修改为《1979 年贸易协定法》《1984 年贸易与关税法》及《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相依条款(第 1301—1310 节内容),而且,还成功地促使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其《金融服务协议》中采纳了“服务贸易”概念。

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因为类似美国国际集团(AIG)、高盛、标准普尔、德勤咨询这类以提供“服务”而非“实物”的大型全球化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竞争力量,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的话,多半是指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不够开放。

按照这一逻辑,目前(2019 年初)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美方一定是要求中国开放更多包括 insurance 在内的“服务贸易”及其经营便利条件,而中方则会希望美国开放更多的“实物”市场,尤其是开放高科技的实物贸易,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以制造业、以实物贸易为主要竞争力的发展阶段。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要想系统而全面地了解现在的保险行业,包括行业生态和行业“痛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要想更好把握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需要先知道中国的保险行业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历史上都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特别重要或有价值的事情,这些事情对后来产生过什么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以及,今天还有什么值得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就是这个道理。

为了再次强调这个观点,我们再引申一下刚才所列举的关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前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的例子。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大会还向十名外国人授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

章”,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是中外保险界的唯一获奖者,获奖理由说他是“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实际上,在保险界,大家都知道并认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经营历史就是一部最好的保险教科书,而格林伯格则被公认为“保险教父”。但要相对系统而完整了解格林伯格究竟是如何“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则应该知道他的主要经历,包括他在美、中政商两界担任过哪些保险业之外的职务,发起并参与过哪些咨询或顾问委员会,具体做过哪些特别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事情对中美两国社会产生过什么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等等。

而与整个燕梳或保险的发展历程相比,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历史仅仅是其中一小段,从 1919 年开始的很精彩的一小段。而格林伯格涉足其中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因此,要想梳理保险发展的全部历程,进而把握其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肯定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下更大的功夫。

作为《茶道燕梳》的茶道信,笔者以为,从中国茶和茶道(西行)的视角来解读燕梳(东渐)到保险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而有效的视角,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四、茶与燕梳的历史渊源

燕梳最初源于为海上贸易提供一种配套的风险转移和分摊机制,而自欧洲开启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或称大航海时代以来,初期都主要是为了寻找前往亚洲的航线,带回东方的香料,先是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舰队到来,葡萄牙还于 1553 年占据了原属广东香山县的澳门,随后是荷兰和英国以“东印度公司”形式组织的舰队,而它们所发现和带回去的主要“香料”,或者说是最主要的贸易物品,就是产自中国的茶,如此一来,西方的燕梳(保险)便与中国的茶关联起来了。

论据之一,英国伦敦劳合社原址,虽然以海上保险的桥头堡著名,其实就是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茶叶拍卖市场。论据之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开埠后最著名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和徐润,是当时的中国人中最懂茶和最懂保险的两个。懂茶,是因为他们需要为洋行采购大量的中国茶,必须懂茶才行,而且,他们自己拥有中国当时最大的茶栈,相当于做了外国洋行与中国茶农之间的中间商或茶叶经纪公司,也赚取了大量财富;同样,懂保险,是因为他们需要帮洋行附设的保险行招揽业务和募集资本,唐廷枢本人也是谏当保安行的股东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鸿章才把这两位洋行大买办挖过来为清政府办事,建立了保险招商局及其仁和与济和水火保



险公司,主要就是为唐廷枢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及其船队与码头货物提供保险服务。

五、“官与民”或“公与私”的关系变迁

茶和燕梳,从古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营方式都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难题,就是融合“官与民”或“公与私”的关系问题。

当今,茶的经营都属于民营经济范畴了,与计划经济时期由“中茶公司”(1951年9月14日成立的中国茶叶总公司)独家经营的状况完全不同。

与中茶公司的经营几乎平行、成立于1949年10月20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独家经营。自

1996年7月起,PICC成为我国金融业股份制改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至今仍在不断深化和探索过程中。而中茶公司的股份制改革,相对比较简单,已经完全民营化。

茶的历史远比燕梳或保险的历史要长,经营过程大致是这样:最初是以小农经济形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直到唐朝中期的唐文宗(原名李涵,后更名李昂,809—840,在位14年)年代,开始推行由朝廷专营专卖制度,亦即实行“榷茶制”,俗称“茶马法”,以茶换马。这套制度延续到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元朝时被废止,而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又恢复了榷茶制,再到明朝被清朝取代,榷茶制又再度被废止。

当燕梳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进入中国时,已属于清朝中后期的嘉庆年间,朝廷禁止洋人传教,但允许洋人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贸易。这时候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特许权(Royal Charter),垄断经营东方贸易。而且,还不仅仅是垄断商业贸易,公司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可以为维护商业利益使用武力,并代表政府管理所征服的殖民地,相当于英国王室和政府的对外承包商。

随后,英国国内开始推崇自由贸易(Laissez-faire)的理念,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813年起失去了对贸易、政治和军事的完全垄断权,进而选择“从政”,代理政府管理以印度为中心的殖民地事务,公司也于1834年解散,这段时期一些离开了公司但仍想继续经商发财的公司职员,便纷纷自立门户,设立了私人性质的商行,包括怡和、宝顺、太古等著名英商洋行。代表并行使英国政府职能的人,则由英国政府派出的领事为之。也正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爆发了与清朝的两次鸦片战争,英国获得了对华贸易的更大市场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控制权,上海则成为最重要的码头,对华贸易畅通无阻,几乎完全自由。

与英国贸易逐步自由化的方向相反,清朝则通过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推行洋务运动,用政府主导的商业方式获取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于1873年1月成立了大型轮船运输企业——轮船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Navigation Company),并于1875年12月在招商局旗下设立了保险招商局(China Merchants' Insurance Company),均采用“官商合办”以及“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获得一定的成功,包括收购了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旗昌洋行及其船队。但随着清朝的崩溃,由政府主导的公营事业也随之瓦解,营商环境进入无政府状态。

六、民国时期的茶与保险

民国政府成立后,尤其是在军阀混战基

本结束后,政府倡导“节制资本”,茶的贸易和保险的经营又逐渐变为由政府主导。1937年5月1日,民国政府成立“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China Tea Co., Ltd)”(同样简称“中茶公司”),主管机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来更名为“贸易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财政部),还于1938年6月14日颁布了《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以法令形式授命贸易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茶叶的出口贸易,统筹收购运销事务。

同一时期,民国政府完全控制的金融体系具有“四行二局一库”的格局,其中,“二局”之一的“中央信托局”积极介入保险经营,曾于1939年7月因抗战需要而创办了“兵险”业务,为全国大量的工厂、仓库物资及交通运输设施在沦陷前有序地撤退到西南大后方提供保险服务,使许多工厂得以边后撤边生产,避免了一些无序撤退中的慌乱与“踩踏”。这算得上是保险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经典案例,中央信托局的“兵险”业务为此作出巨大贡献。

具体为中央信托局经办这项业务的十三位保险业务骨干,曾被称为“十三太保”,他们是中国保险史上的功臣。民国政府贸易委员会旗下最重要的祁门茶厂,也是在这期间先撤到湖北恩施建厂生产,在武汉陷落之前继续南撤,最后落地云南凤庆,建立了生产“滇红”的风庆茶厂。

七、“十三太保”与“八百壮士”

笔者想借此机会特别提及和感谢“十三太保”中的一位。他当年是英商保裕保险公司的职员,为参与抗战而加入中央信托局投入“兵险”业务,抗战后去了香港并创办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被称为“世界船王”,他的名字叫包玉刚(1918—1991)。

1985年5月和11月,包玉刚先生分别向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提出,设立一项为期十年(1987—1996年)的“中英友好奖学金计

划”,每年选派优秀人才赴英国留学,俗称为中国培养“八百壮士”,该提议获得中英两国政府的同意,三方(中英两国政府和包玉刚基金会)于1986年6月9日在伦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包玉刚爵士基金会和英国关于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的谅解备忘录》,三方各出三之一的费用支持该计划,包玉刚基金会所出的费用是每年140万英镑。受该计划资助赴英留学的中国人远远超过800人,实际派出人数为1728人,但极大多数都是做短期访问和研究的学者,只有很少一批是去攻读博士学位的。笔者很荣幸成为1991年度从上海市各高校中选派出的唯一一名赴英攻读博士学位的中英友好奖学金获得者,并顺利完成留学任务回国服务,所以也特别感谢这位当年的“十三太保”之一。只是,笔者现在有点疑惑,如果包玉刚先生在天有灵,知道当年费心培养的“八百壮士”之一,现在混成了“茶道僧”,会不会跳起来用他的宁波方言骂我“脑子靠耶掉,寿头刮气”!

是啊,看看同一年从长春地质学院选派出的黄大年同学,与笔者一起参加出国培训,就读于英国同一所大学,一度同住一所宿舍、同吃一口锅里的饭,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回国服务,可人家成了大英雄、时代楷模,而笔者则成了泡茶聊茶的“茶道僧”,是有点“寿头刮气”。好在,还能聊聊当年的“十三太保”。

扯远了,回到主题。简略回顾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目的在于说明茶与燕梳或保险在经营过程中确实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彼此可以相互借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八、未来探究空间

茶道西行与燕梳东渐的交融过程,远比上面简要描述的内容复杂。其中最需要梳理和探究的内容之一,很可能是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茶与燕梳所蕴含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本身又是一个

很庞大的议题。

其一,最早将中国的茶与西方的燕梳关联在一起的人,包括唐廷枢兄弟三人及其唐氏家族,以及徐润、郑观应等来自广东香山的第一代买办们,都是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那里学会英语并通过为洋行工作而掌握“夷技”的,其中的典范就是唐廷枢,他从马礼逊学校学成英语后,在香港和上海先后做了十年翻译工作,然后进入怡和洋行并逐渐升任洋行总买办,不仅附股成为“谏当保安行”股东,还与其他买办、同乡和亲戚投资过7家茶栈为洋行收购茶叶,最后再转型为清政府的红顶商人。

其二,在海上保险和陆地保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寿保险,与西方教会密切相关,近年的畅销书《人类简史》第248~250页中,详细讲述了两位苏格兰长老会教士亚历山大·韦伯斯特(Alexander Webster)和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于1744年创立苏格兰遗孀基金(Scottish Widows)的故事。据说,当今的寿险营销模式中,仍延续了基督教的某些传播方式的元素。当然,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总之,回顾历史,茶道与燕梳,一个向西行,一个朝东来,彼此相互碰撞与融合,成为了今天的保险,也留给《茶道燕梳》一个巨大的探究空间。静观当下,比如去参观“2018上海进博会”,会看到西方的茶道也正在东渐,而观察国内一些大型保险公司的经营策略,则会发现中国的保险也在努力西行,走向世界。

西行与东渐,来来往往,彼此借鉴,相互影响,合作是主流,也难免有碰撞,这个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很像徐志摩在《偶然》中描述的那样: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